

# 私营企业政治资本与国有银行借贷的实证研究

冯天丽, 井润田, 王国锋

(电子科技大学 经济与管理学院, 四川 成都 610054)

**摘要:**本文以 2006 年“全国私营企业调查”数据中有借贷情况存在的私营企业为样本,从个体层面和组织层面研究私营企业政治资本对私营企业借贷能力的影响,即在同一所有制内分析私营企业从国有银行借贷能力差异的原因。研究发现:(1)私营企业从国有银行借贷的可能性具有显著的差异;(2)在个体层面,私营企业主的政治身份、党政国企经历有利于私营企业从国有银行获得借贷;(3)在组织层面,改制收购而来的私营企业相对于非改制收购而来的企业更易于获得国有银行的借贷;(4)个体层面的企业政治资本对于从国有银行进行借贷显得更为重要;(5)国有银行借贷时更加注重企业现有的质量(规模、企业年龄)和企业主现有的政治身份。

**关键词:**私营企业;政治资本;银行借贷

中图分类号:F27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192(2010)03-0031-07

## An Empirical Study on Political Capital and the Accession to Loan from State-owned Banks of Chinese Private Enterprises

FENG Tian-li, JING Run-tian, WANG Guo-feng

(School of Management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hina, Chengdu 610054, China)

**Abstract:** Drawing on the national survey on Chinese private firms in 2006,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influence of political capital of firms (personal level and organizational level) on the origin of firm loan, i. e.,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reason of different capability of loaning from state-owned banks in private firms. It is found that, the probability of access to loan from state-owned bank is completely different according to firm political capital. On personal level, firm owner's political status and experiences in government or state-owned company are good information and useful for attaining loan from state banks; on organizational level, firms which are transformed or acquired from collective or state-owned can get loan from state bank much easier than those born private firms. In addition, political capital in personal level is more important than that in organizational level for obtaining loan; when providing loan, state-own banks have been paying much attention to the political status of firm owner and firm quality like firm size or firm age. In general, this paper proposes and verifies the reason that why Chinese private firms have different treatments from state banks in transitional economy.

**Key words:** private firm; political capital; accession to bank loan

### 1 引言

私营企业已经成为我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据国家工商局统计,2006 年末全国注册私营企业 498.1 万户,比上年增加 15.81%;其中,第二产业 166.0 万户,增加 23.3 万户,增长 16.3%,占总户数的 33.3%;第三产业 322.3 万户,增加 44.1 万户,增长 15.9%,占总户数的 64.7%,私营企业数量占全国各类企业总数的比重达 57.4%。从业人员 6586.3 万人,比上年增加 13.09%<sup>[1]</sup>。截至

2007 年第三季度,登记注册的全国私营企业达 538.7 万户,比 2006 年底增长 8.2%;从业人员为 7058.6 万人,增长 7.2%<sup>[2]</sup>,私营企业在利税、出口、科技创新方面也有突出表现。然而在私营企业发展过程中,也存在许多阻碍因素,比如政府主管部门对市场管理的方式和内容没有相应调整、私企治理结构问题、缺乏竞争优势、中小企业服务体系不健全等等。其中,私营企业融资问题受到学界和实业界的很多关注,“融资难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民营经济发展的瓶颈”,“在向国有商业银行申

收稿日期:2009-02-17

基金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资助项目(NCET-06-0804);电子科技大学创新团队与学术带头人培养计划资助项目

请贷款时,非公有制企业往往受到所有制歧视和规模歧视”<sup>[3]</sup>。从信贷增长结构分析,近年来民营经济仍处于国有经济的补充地位,正规金融体系是在优先满足国有经济信贷需求之后,再给民营经济一定的信贷支持<sup>[4]</sup>。

由于国内资本市场仍存在诸多问题<sup>[5]</sup>,对于民营企业来说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融资难,有许多研究指出了私营企业融资难的原因,并将其与国有企业融资进行比较<sup>[6,7]</sup>,借贷领域还是不平等的,当地政府继续影响银行借贷以有利于国有企业<sup>[8]</sup>,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显著大于国有企业<sup>[9]</sup>。然而在私营企业之间也存在借贷难易的不同,对此差异进行探讨无疑有助于我们对其中差异成因的理解。近年来社会资本理论得到了许多学科的重视和研究,对发展中国家来说,由于市场、法律等正式体系不完善,信息既不完全也不充分,企业主的社会纽带或社会关系可以替代不充分的正式体制<sup>[10,11]</sup>,在企业和个人发展中发挥作用的空间就特别大,例如,社会资本与企业业绩、个人职业寻找与成功等方面的研究<sup>[12,13,14]</sup>。企业可以通过和政府的关系获取商业机会如基础设施建设、政府采购、关键资源的获得如土地,以及有利的政府规制和政府影响,如政府部门对其他与政府有关的部门(如对银行)可以施加影响<sup>[15]</sup>。特别地,由企业主政治身份以及企业原有的性质等所形成的政治资本可能会为民营企业提供类似于国有企业的身份。相对于国有企业与政府之间的天然“血缘”关系,政企关系对转轨期民营企业发展的影响更为重要。虽然许多研究强调企业政治关系对民营企业发展的重要性,然而他们没有对企业政治关系影响企业成长机制作深入分析<sup>[16]</sup>。本文正是基于以上考虑,研究民营企业政治资本,包括个体层面和组织层面,对民营企业借贷来源的影响。研究结论对中国转型经济情况下的民营企业发展和政策制定具有积极意义。

## 2 理论回顾和假设提出

政治资本的界定:边燕杰在研究企业社会资本对企业业绩影响的时候,强调“中国背景下的公司不是相互孤立的,它们获取和调用稀缺资源的能力取决于它们与政府部门、产业内或产业外公司以及与

其他经济实体的关系”,将企业社会资本定义为“公司领导人或经理在社会、经济和社交生活中的网络关系,或者网络成员身份”,而其中非常重要的方面即为“通过与政府的主管部门的纵向等级关系来获取稀缺资源”<sup>[17]</sup>,如获得有利的政策、税收优惠、银行贷款等重要资源,从而提高企业盈利能力<sup>[18,19]</sup>。Khawaja & Mian<sup>[20]</sup>研究了巴基斯坦的企业信贷情况,他发现那些与政府有联系的企业可以获得两次以上的贷款,并且比其他企业有50%的利率优惠,并能获得国有银行的专项贷款。Faccio等人研究了在1997至2002年6年间35个国家的450家有政治关联的企业和能相配对的同等企业,发现有政治关联的企业比没有关联的企业借的钱更多,它们在遇到经济困难时也更可能受到它们本国政府的援助<sup>[21]</sup>。因此,转型期民营企业除了通过亲朋好友进行“关系融资”<sup>[22]</sup>、地下钱庄等方式弥补资本市场的不足,通过和政府的联系改善其融资困境可能是其重要途径之一。Li和Zhang在研究政治网络和职能经验对新建企业业绩影响时,直接将管理者的政治网络看作他们的社会资本<sup>[23]</sup>。确切的说,社会资本由哪些要素所构成仍然是个挑战,在该领域还有很多工作要做<sup>[13]</sup>。本文重点考虑私营企业主身份和企业原有的性质及由此构建的网络关系对私营企业借贷的影响,并将其定义为私营企业的政治资本。也有研究将其称为经理人政治网络<sup>[23]</sup>、政治关系<sup>[19]</sup>、政治身份<sup>[24]</sup>、政治资源<sup>[16]</sup>、政治参与<sup>[25]</sup>等,本文统一称之为政治资本,它反映了政治身份或性质可以实际或潜在地为拥有者带来资源,具有资本的属性。

在转型经济中市场机制(即资源主要由市场进行分配)和再分配机制(即主要由政府机构进行分配)同时存在<sup>[26]</sup>。制度理论认为,转型经济中外部市场的局限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的干预或掌握资源分配,政府往往掌握着关键的生产资源的计划和分配,包括银行<sup>[27,28]</sup>。在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许多行业都存在着政府行政壁垒和所有制“歧视”,民营企业的进入受到了很大限制,制约了民营企业的发展。在银行贷款方面,如果向民营企业发放贷款,一旦民营企业经营不善导致贷款无法收回,那么银行贷款员将面临着收受民营企业贿赂的质疑。在信息不对称的环境下,作为风险厌恶的银行信贷员更倾向于拒绝向

民营企业发放贷款<sup>[24]</sup>。民营企业的发展离不开资金的支持,然而,一方面,从全国范围来看,国有银行是资金借贷的主要提供者;另一方面,国有银行和政府、国有企业在原有体制及转型经济下具有密切的联系。在中国转型经济中,管理者与政府官员的关系代表着一种独特类型的管理资源<sup>[29]</sup>。管理者的政治网络是嵌入在制度情境中的,政治网络对非国有企业来说是很关键的,因为它可以作为不完善的政治制度支持的替代<sup>[23]</sup>。这些公司能够影响政府官员,使得官员的利益和他们自己的相一致<sup>[12]</sup>。

Peng 和 Luo 发现管理者与政府官员的关系正相关于非国有企业的业绩而在国有企业则不存在这种关联,认为嵌入在管理者关系中的社会资本在弱制度性支持和扭曲信息为特征的不完全竞争中显得更为重要<sup>[30]</sup>。胡旭阳以浙江省 2004 年民营百强企业为样本,通过研究民企创始人政治身份与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可能性之间的关系,发现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通过传递民营企业质量信号降低了民营企业进入金融业的壁垒,提供了民营企业的资本获得能力,促进了民营企业的发展<sup>[24]</sup>。虽然政府对银行的影响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已经下降,但他们仍然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影响银行贷款。比如温州市政府选择一些企业作为重点企业就可以间接地影响银行的贷款决定。一旦贷款出问题的时候,负责信贷的银行职员可以减轻责任<sup>[15]</sup>。

Lin 的社会资源理论认为,社会资源就是那些嵌入个人社会网络中的资源,这种资源不为个人所直接占有,而是通过个人直接或间接的社会关系获取,拥有这种资源可以使个人更好地满足自身生存发展的需要<sup>[31]</sup>。企业资源是企业生产过程中投入的各种要素,为企业获得竞争优势提供了基础。Barney 提出了企业获得竞争优势所投入资源的五个充分条件:必须有价值;必须稀缺;必须是不能完全被仿制的;其他资源无法替代;以低于其价值的价格为企业所获得<sup>[32,33]</sup>。

可以说,私营企业主的政治资本正是在转型经济情境下的独特资源,符合 Barney 所说的特点,同时该资源又嵌入在社会网络中,另外,也向银行传递了质量信号,相对于不具有或政治资本很少的民营企业来说,这些都为企业带来了发展的资源和加强了竞争优势,因此,我们提出:

**假设 1** 私营企业主拥有的政治资本越多,借贷结构中来自国有银行借贷的可能性会越大。

资源理论的代表性人物 Barney 提出“组织资本资源”概念,认为其主要包括企业向上汇报的层级、计划、控制和协调系统以及企业与环境间的非正式关系<sup>[33]</sup>。将企业与外部环境间的非正式关系纳入到资源的范畴。Pennings、Lee 和 Witteloostuijn 明确指出了企业的社会资本是企业组织的一种独特资源<sup>[34]</sup>。作为企业社会资本重要内涵的企业政治资本具有价值、稀缺性、异质性和难以模仿、不易替代等特点,为企业获得竞争优势创造了条件。Frydman 等对捷克、匈牙利与波兰的研究表明,银行对具有政府背景的企业往往存在金融软约束,而且软约束不仅体现在事前的签约,还表现在事中的监督与控制以及事后的契约执行<sup>[35]</sup>。从私营企业出身来源来看,如果是来自改制收购(国有、集体企业),由于原企业与政府、银行等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相对于其他企业来说,新的企业组织形式、组织制度加上旧有的联系为企业借贷、发展创造了条件。

另外,正如诺斯指出的,制度具有历史惯性,新制度内生于旧制度,制度变迁具有明显的“路径依赖”特性<sup>[36]</sup>,来自改制收购的私营企业的发展存在某种程度的路径依赖,相对于非改制收购企业来说,即使是改制完成之后,还是对原有国有银行借贷存在某种惯性,利用这种联系,而从社会网络的观点来看,这些联系为企业的借贷增加了便利性、竞争性。

**假设 2** 私营企业组织层面的政治资本越高,借贷结构中来自国有银行借贷的可能性越大。

### 3 研究方法

#### 3.1 研究样本

本文研究样本来自中共中央统战部、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中国(私)营经济研究会 2006 年 3 月组织的“全国私营企业调查”。调查由各地工商联和工商局具体执行,问卷的有效回收率高达 80%,有效问卷数约占全国私营企业总数的 1.0%,问卷的所有问题都由私营企业主本人回答。2006 年的数据共有企业 3837 个,本文选取其中有资金借贷的私营企业共 2059 个,占 53.66%。有关样本的特征见表 1。私

营企业主中男性占 89.6%, 共 1845 人; 年龄在 41~50 岁间的占到近一半, 分布较为正常。私营企业在调查前 10 年内建立的占 74.41%, 主要从事的行业居前三位的分别是制造业占 45.8%、批发零售占 15%、农林牧渔占 7.1%。

表 1 私营企业部分特征描述

项目	分类	数量	百分比(%)
企业主 年龄	≤30 岁	55	2.7
	31~40 岁	529	25.7
	41~50 岁	944	45.8
	51~60 岁	471	22.9
	>60 岁	53	2.6
	缺失	7	0.3
参与 组织	中共党员	880	42.7
	共青团员	90	4.4
	民主党派	96	4.7
	无党派人士	809	39.3
	缺失	184	8.9
企业 年龄	1~5 年	790	38.4
	6~10 年	742	36.0
	11~15 年	332	16.1
	>15 年	133	6.5
	缺失	62	3.0

### 3.2 变量度量

#### 3.2.1 因变量: 借贷来源

本文我们主要考虑私营企业借贷的来源是否来自国有银行(logistic 回归), 如来自国有银行, 定义为 1; 否则, 定义为 0(其他资金借贷来源为股份制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和信用社、民间金融机构、个人借贷、境外银行)。

#### 3.2.2 自变量: 企业政治资本

个体层面: 在谈及高层管理团队对企业的影响时, 张建君、李宏伟认为“把研究重点放在企业家(CEO)个人上而不是高层管理团队上是符合我国中小企业的现实的”<sup>[37]</sup>。我们用三个变量来衡量个体层面的企业政治资本:

(1) 政治身份。在企业获得的政治资源中, 有些是容易被观察到的, 比如企业主要创始人获得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的身份参政、议政; 而有些行为则不易被外界所观察, 比如与地方官员的私人关系。从数据的可获得性角度, 本文采用容易观测到的行为来表示私营企业主政治资本的主要方面, 即其主要创始人和所有者是否为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sup>[16]</sup>。如表 2 所示, 以 5 代表全国人大代表或政

协委员, 等等。

表 2 私营企业主政治身份状况

政治身份类型	含义	数量	比例(%)
5	全国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7	0.3
4	省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64	3.1
3	地市级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297	14.4
2	县(市)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522	25.4
1	乡级人大代表	82	4.0
0	非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	1087	52.8

(2) 政治面貌。共有四种类型的组织, 分别是中共、共青团、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群众), 用三个哑变量来代替, 其中中共作为比较的基底。参与这几种组织同样也表示了成员的政治身份及其网络关系。

(3) 党政国企经历。企业主是否担任过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干部, 或者国有、集体企业中的负责人。如担任过, 定义为 1, 否则, 定义为 0。

组织层面: 企业如果是改制收购(原有企业主要是国有或集体企业)而来, 定义为 1, 否则, 定义为 0。相对于没有经过改制收购的企业来说, 改制企业和原企业存在着一定的传承关系。

#### 3.2.3 控制变量

企业规模、企业年龄、教育程度、企业主性别可能会对私营企业能否从国有银行贷款产生影响, 因此需对这些变量进行控制<sup>[8,24]</sup>。同时, 我们控制了公司的盈利状况, 因为盈利越好的企业可能越容易获得银行的信任, 从而有利于获得贷款。在此, 本文没有将私营企业主的年龄放入模型, 因其与企业年龄存在高度相关, 用公司年龄即可。

其中企业规模用 2005 年底的企业职工人数的自然对数进行衡量, 由于职工人数绝对值较大且分散, 所以统计分析时使用其对数值<sup>[38]</sup>。盈利情况采用 2005 年的平均销售利润率来衡量。企业年龄以 2006-私企注册年份来近似代替。教育程度分为: 1 = 小学, 2 = 初中, 3 = 高中、中专, 4 = 大专, 5 = 大学, 6 = 研究生。企业主性别: 1 = 男性, 0 = 女性。

## 4 研究结果

表 3 列出了各变量的均值和相关系数。有资金借贷的样本中, 私营企业主的文化程度平均来看趋于在高中(中专)和大专之间。平均有 38% 的企业主有党政国企经历。变量间相关较为显著, 相关系数不算高, 不会存在严重的多重共线性。

表3 变量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样本量	性别	教育程度	企业年龄	企业规模	改制收购	党政国企经历	政治身份
性别	0.90	0.30	2057							
教育程度	3.56	1.06	2050	0.022						
企业年龄	7.49	4.52	1997	0.050 <sup>*</sup>	-0.018					
企业规模	4.23	1.53	1995	0.105 <sup>**</sup>	0.189 <sup>**</sup>	0.260 <sup>**</sup>				
盈利状况	0.07	0.15	1817	-0.032	-0.002	-0.027	-0.108 <sup>**</sup>			
改制收购	0.25	0.43	1942	0.081 <sup>**</sup>	0.074 <sup>**</sup>	-0.094 <sup>**</sup>	0.226 <sup>**</sup>			
党政国企经历	0.38	0.49	2059	0.066 <sup>**</sup>	0.266 <sup>**</sup>	-0.066 <sup>**</sup>	0.101 <sup>**</sup>	0.244 <sup>**</sup>		
政治身份	1.12	1.30	2059	0.052 <sup>*</sup>	0.145 <sup>**</sup>	0.275 <sup>**</sup>	0.408 <sup>**</sup>	0.085 <sup>**</sup>	0.066 <sup>**</sup>	
借贷来源	0.58	0.49	2059	0.013	0.040	0.155 <sup>**</sup>	0.232 <sup>**</sup>	0.100 <sup>**</sup>	0.079 <sup>**</sup>	0.192 <sup>**</sup>

注: \*\*表示0.01水平上显著(双侧); \*表示0.05水平上显著(双侧)。

我们使用逻辑回归对民营企业借贷来源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如表4所示,对回归系数使用的检验为Wald检验。首先将控制变量放入方程进

行分析(模型1),然后将各个影响因素分别放入(模型2~5),最后将所有影响因素放入得到模型6。

表4 逻辑回归分析

变量	模型1 控制变量	模型2 党政国企经历	模型3 政治身份	模型4 政治面貌	模型5 改制收购	模型6 全部
性别	-0.097	-0.137	-0.101	-0.104	-0.173	-0.200
教育程度	-0.009	-0.048	-0.026	-0.019	-0.020	-0.069
企业年龄	0.042 <sup>**</sup>	0.044 <sup>***</sup>	0.033 <sup>**</sup>	0.044 <sup>***</sup>	0.049 <sup>***</sup>	0.044 <sup>**</sup>
企业规模	0.350 <sup>***</sup>	0.346 <sup>***</sup>	0.303 <sup>***</sup>	0.352 <sup>***</sup>	0.307 <sup>***</sup>	0.270 <sup>***</sup>
盈利状况	1.40 <sup>***</sup>	1.48 <sup>***</sup>	1.38 <sup>**</sup>	1.380 <sup>***</sup>	1.585 <sup>***</sup>	1.579 <sup>***</sup>
党政国企经历		0.338 <sup>**</sup>				0.266 <sup>*</sup>
政治身份			0.167 <sup>***</sup>			0.168 <sup>***</sup>
共青团				0.268		0.350
民主党派				-0.162		-0.317
无党派人士(群众)				-0.109		-0.036
改制收购					0.481 <sup>***</sup>	0.380 <sup>**</sup>
常数	-1.444 <sup>***</sup>	-1.406 <sup>***</sup>	-1.293 <sup>***</sup>	-1.360 <sup>***</sup>	-1.318 <sup>***</sup>	-1.146 <sup>***</sup>
-2Log likelihood	2074.6	2065.7	2061.6	2069.5	1950.2	1929.2
Cox & Snell R <sup>2</sup>	0.078	0.083	0.085	0.081	0.083	0.095
Nagelkerke R <sup>2</sup>	0.107	0.116	0.126	0.120	0.112	0.133

注: \*\*\*表示0.001水平上显著(双侧); \*\*表示0.01水平上显著(双侧); \*表示0.05水平上显著(双侧)。

表4可以看出,企业规模、企业年龄和企业盈利状况的确对因变量借贷来源存在着正向的效应。企业历史越长,表明企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来,社会知名度提高,这可能有助于企业建立声誉和传递信息<sup>[18]</sup>;企业的盈利状况和企业规模同样也反映了企业的实力和一定的偿债能力,也是银行进行借贷与否的重要指标。企业主性别和教育程度对企业能否从国有银行借贷没有显著影响,女性稍占优

势(偏回归系数为-0.097)。教育程度与因变量也存在不显著的负相关关系,可能的一个原因是民营企业主学历高的更多集中于年轻一代企业家,而由于民营企业中很大程度上都为家族企业<sup>[18]</sup>,因此这些企业主的借贷可能多数源于泛家族内,从而弱化甚至反向了教育程度与因变量的关系。

个体层面上,民营企业主的党政国企经历和政治身份使企业从国有银行借贷的可能性大大提高,

党政国企经历和政治身份作为企业主自身的资源能力的一种反映,以及私营企业主所建立的与企业、政府、银行等网络为私营企业增加了获得国有银行贷款的可能性。从偏回归系数为负来看,党员相比其他类型来说对因变量有正向作用,然而政治面貌对因变量没有显著影响(逻辑回归对分类变量所进行总体检验的  $P$  值为 0.142,说明该分类变量对因变量没有影响<sup>[38]</sup>,假设 1 得到了部分验证。

组织层面上,私营企业如果来自改制收购(国有、集体企业),那么与其他企业相比,则具有从国有银行获得贷款的优势。一方面原有企业的国有或集体属性可能还对从国有银行借贷产生正面影响;另一方面,总体而言,改制收购所产生的减员增效对从国有银行借贷也有积极影响,两方面的因素使得来自改制收购后的私营企业更易于从国有银行获得贷款。因此,假设 2 获得了验证。在所有模型中,似然比(-2Log likelihood)表明回归模型具有统计意义,Cox & Snell  $R^2$  和 Nagelkerke  $R^2$  所反映的样本拟合程度较好,且总模型优于其他模型。

## 5 总结与讨论

信贷融资是我国融资体系的主体,2006 年贷款在全部融资中的比重高达 82%,根据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执行报告披露的消息,2006 年贷款、股票、国债、企业债券(包括企业短期融资券)之比为 80.2:3.4:9.8:6.6。从信贷增长结构分析,近年来民营经济仍处于国有经济的补充地位,正规金融体系对民营经济信贷供给增长会慢于 GDP 增长<sup>[4]</sup>。在向国有商业银行申请贷款时,非公有制企业往往会受到所有制歧视和规模歧视。其中的原因是银行现行的机制使它们倾向于追求风险较小的有政府背景的企业<sup>[3]</sup>。而一些私营企业政治资本的存在恰恰为私营企业提供了政府或者国有、集体企业的背景。

以往有关私营企业融资或借贷的研究很多都是与国有企业等不同所有制类型进行比较,从所有制之间所存在的差异进行研究。本文的研究说明了同一所有制内,有借贷需求的私营企业从国有银行借贷的可能性也是存在差异的。从转型经济的实际出发,本文探讨了私营企业政治资本对其借贷来源的影响,将私营企业政治资本分为两个层面(私营企业主的层面、组织层面)进行研究,相对以前只以私营企业主本身资本来替代私营企业资本

考虑更为全面合理<sup>[12,13,17]</sup>。得出以下结论,在个体层面:私营企业主的政治身份、党政国企经历有利于私营企业从国有银行获得借贷;在组织层面:改制收购(国有、集体企业)而来的私营企业相对于非改制收购而来的更易于获得国有银行的借贷。当然,控制变量中的企业规模、企业盈利状况及企业年龄都对从国有银行借贷产生了积极影响,它们反映了企业的生存能力和发展潜力对企业获取国有银行借贷有积极作用。

另外,本文也获得了比较有趣的结论,从最后的全模型(模型 6),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党政国企经历和改制收购都与因变量有显著关系,但从模型 5 中的显著影响( $P < 0.001$ )到模型 6 中显著程度都有所降低,个体层面的企业政治资本对于从国有银行进行借贷显得更为重要;另一方面,企业规模、企业盈利状况、政治身份( $P < 0.001$ ),相对于改制收购、党政国企经历( $P < 0.01$ )更为显著,反映了国有银行借贷时更加注重企业现有的质量(规模、盈利状况)和企业主现有的能力(政治身份),从某种程度上说明了,随着中国经济发展和改革,国有企业借贷也在进一步向市场化过渡。

当然,本文只考虑了组织层面政治资本中的改制收购方面,也曾考虑过其他国有集体企业、政府在私营企业中是否具有所有者权益,但这种情况在此样本中比例太低。以后的研究可以考虑组织层面的其他政治资本。还可以考虑其他的情境因素中政治资本的角色不同,比如在高科技行业和低科技行业中<sup>[23]</sup>。企业家及企业所拥有的政治资本同样也会为企业获取其他重要资源产生影响,比如市场机会等。当然,我们也需要注意到政治资本的消极作用,正如 Portes 指出社会资本的消极作用:会排斥圈外人,禁止他人获得收益<sup>[40]</sup>,另外,人际关系和权力相结合也扩大了腐败的可能和范围。因此,公司应该逐渐注意建立市场相关的竞争能力,从而抓住这些经济中新出现的市场机会<sup>[23]</sup>。

## 参 考 文 献:

- [1]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小企业司. 中国中小企业发展报告(2007)[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 [2] 金正实. 中国民营经济期待新政[J]. 中国民营科技与经济,2008,(4):63-65.
- [3] 厉以宁. 厉以宁论民营经济[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4] 纪敏,王新华. 中国民营经济融资报告. 黄孟复.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报告[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

- [5] 秦玉峰,朱启晨. 试述我国资本市场发展不足[J]. 商业研究,2008,(10):118-121.
- [6] 尼尔·格雷戈里,斯托伊安·塔涅夫. 中国民营企业的融资问题[J]. 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1,(6):51-55.
- [7] 邹新月,施锡铨. 非国有经济信贷融资困境的理性认识[J]. 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2,4(4):26-31.
- [8] Gregory N, Tenev S. China's home-grown entrepreneurs [J]. *China Business Review*, 2001, 28(1): 14-18.
- [9] 张纯,吕伟. 机构投资者、终极产权与融资约束[J]. 管理世界,2007,(11):119-126.
- [10] Peng M W. Institutional transitions and strategic choices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2003, 23(2): 275-296.
- [11] Xin K R, Pearce J L. Guanxi: connections as substitutes for formal institutional support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6, 39(6): 1641-1658.
- [12] Zhang Q, Fung H G. China's social capital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private enterprises [J]. *Journal of Small Business and Enterprise Development*, 2006, 13(2): 198-207.
- [13] Fung H G, Xu X E, et al.. On the financial performance of private enterprises in China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al Entrepreneurship*, 2007, 12(4): 399-414.
- [14] 郭毅,罗家德. 社会资本与管理学[M]. 上海: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07.
- [15] 张建军,张志学. 中国民营企业家的政治战略[J]. 管理世界,2005,(7):94-105.
- [16] 胡旭阳,史晋川. 民营企业的政治资源与民营企业多元化投资——以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为例[J]. 中国工业经济,2008,(4):5-14.
- [17] 边燕杰. 公司的社会资本及其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社会网络分析[A]. 徐淑英,刘忠明. 中国企业管理的前沿研究[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18] Shleifer A, Vishny R. Legal determinants of external finance [J]. *The Journal of Finance*, 1997, (52): 1131-1150.
- [19] Fisman R. Estimating the value of political connection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01, (91): 1095-1102.
- [20] Khwaja A I, Mian A. Do lenders favor politically connected firms? Rent provision in an emerging financial market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2005, 120(4): 1371-1411.
- [21] Faccio M, Masulis R W, McConnell J. Political connections and corporate bailouts [J]. *Journal of Finance*, 2006, (6): 2597-2635.
- [22] 陈伟鸿. 民营企业“关系融资”及其拓展[J]. 管理世界,2004,(10):143-144.
- [23] Li H, Zhang Y. The role of managers' political networking and functional experience in new venture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s transition economy [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07, 28(8): 791-804.
- [24] 胡旭阳. 民营企业家的政治身份与民营企业的融资便利——以浙江省民营百强企业为例[J]. 管理世界,2006,(5):107-113.
- [25] 敖带牙. 私营企业主阶层的政治参与[M]. 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
- [26] Zhou X.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and income inequality in urban China: evidence from panel data [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2000, 105(4): 1135-1174.
- [27] Nee V. Organizational dynamics of market transition: hybrid forms, property rights and mixed economy in China [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2, (37):1-27.
- [28] McMillan J. Market institutions. In Durlauf S, Blume L, eds. *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 [M]. 2nd ed. Palgrave Macmillan: London, 2008.
- [29] Li H, Atuahene-Gima K. Product innovation strategy and the performance of new technology ventures in China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1, 44(6): 1123-1134.
- [30] Peng M W, Luo Y. Managerial ties and firm performance in a transition economy: the nature of a micro-macro link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000, 43(3): 486-501.
- [31] Nan L. Social resources and instrumental action. In Marsden P V, Lin N, eds. *Social Structure and Network Analysis* [M]. CA, Sage Publications, Inc, 1982.
- [32] Barney J. Organizational culture: can it be a source of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86, 11(3): 656-665.
- [33] Barney J. 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91, 17(1): 99-120.
- [34] Pennings J M, Lee K, et al.. Human capital, social capital, and firm dissolution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1998, 41(4): 425-440.
- [35] Frydman R, et al.. The limits of discipline: ownership and hard budget constraints in the transition economies [R]. Columbia Law School, Working Paper No.165, 2000.
- [36] 诺斯. 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 航行译. 北京:格致出版社,2008.
- [37] 张建君,李宏伟. 私营企业的企业家背景、多元化战略与企业业绩[J]. 南开管理评论,2007,10(5):12-25.
- [38] 张文彤,董伟. SPSS 统计分析高级教程[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
- [39] 王晓晖. 中国民营经济发展与企业竞争力,研讨会综述[J]. 管理世界,2003,(10):133-136.
- [40] Portes A. Social capital: its origins and applications in modern sociology [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1998, 24(1): 1-24.